

王梦奎随笔

文匯出版社



王梦奎随笔



文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王梦奎随笔/王梦奎著. —上海: 文汇出版社, 2005. 8

ISBN 7-80676-826-2

I. 王... II. 王... III. 随笔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71232 号

王梦奎随笔

作 者 / 王梦奎

责任编辑 / 陈润华

封面装帧 / 夏 平

出版发行 / 文汇出版社

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

(邮政编码 200041)

经 销 / 全国新华书店

照 排 /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印刷装订 / 上海长阳印刷厂

版 次 / 2005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/ 640×940 1/16

字 数 / 290 千

印 张 / 22.875

ISBN 7-80676-826-2/F·057

定价: 35.00 元

题 记

在两位年轻朋友的协助下，将二十多年来的随笔选编结集。搜索枯肠，无以名之。径直称作王梦奎随笔，无非是表明作者其谁，文类为何而已。

我个人的写作大体上是在公务之余进行的，是余情或者余事；文类则主要是论说。这些丛杂的文章可以说是余情之余情，余事之余事。对写作的执着与追求是一样的，有时甚至更为苛严。所不同的是一个“随”字，随心所欲，也就是孔夫子所说的“从心所欲不逾矩”。这是很难企及的境界，虽不能至，心向往之。

龚自珍诗曰：“未济终焉心飘缈，百事反从阙陷好。吟到夕阳山外山，古今谁免余情绕。”这是人生的感悟。我早已过了心飘缈的年龄，但笔墨生涯尚未济于终焉。愿以这本集子作为新的起点，用余生多写一些此类随心所欲的文章，也希望写得更好些。

王梦奎

目 录

人物与纪念

001

我与北大 / 003

北大旧事 / 007

北大旧事续记 / 012

北大旧事三记 / 017

沁阳师范杂忆 / 024

嘉树新株自栋梁 / 030

领导·老师·“同学” / 033

最后的告别 / 040

悼念陈岱孙先生 / 044

纪念孙冶方 / 048

马首是瞻 / 050

文如其人 / 054

参加香港回归庆典记 / 058

断想与随感

- 办报谈 / 069
大潮中的一支清溪 / 073
文化体制改革断想 / 075
文章写作杂谈 / 078
联语杂记 / 085
随感录 / 088
“水浒”有疵 / 091
观音的性别 / 093
“发”的故事 / 096
餐桌上的话题 / 099
随笔漫谈 / 101

夜读札记

- 从列宁的一篇序言说起 / 107
我读《打赌》 / 110
关于逮捕“四人帮”一则记述的质疑 / 115
英雄和明星 / 119
《姚依林百夕谈》 / 122
失败者的独白 / 126
世界千年经济史中的中国 / 133
有益的警示 / 139
温县历史上的名人 / 144
《走过菜市口》辨正 / 147

前言后语

- 我的学习和写作 / 151
- 秉笔临窗未觉迟 / 155
- 笔墨生涯回望 / 157
- 自选集序 / 163
- 书缘 / 165
- 《前言后语》前言 / 167
- 《怎样写文章》前言、后记和增订本前言 / 172
- 文章四境界说 / 175
- 新世纪从何年算起 / 177
- 《德国的农村经济与合作制》序 / 181
- 《追赶型经济增长理论与实践》序 / 184
- 《农民教育学》序 / 186
- 《烟史闻见录》序 / 188
- 我看司马懿 / 190
- 成才杂说 / 192
- 《五松居咏怀》序 / 195
- 征途万里赋新诗 / 197
- 作家笔下的政治 / 199
- 《中国发展观察》发刊辞 / 201

书 简

- 踏过千峰路自平 / 205
- 题朱载堉纪念馆诗 / 210

- 对甲骨文碑释文排列的意见 / 212
- 访康有为故居 / 214
- 鲁迅怎样写文章 / 216
- 我读孙犁 / 219
- 致李昌 / 221
- 喜听学苑说诗人 / 224
- 却逢花甲忆儿时 / 226
- 关于《中国大百科全书》条目的通信 / 228
- 关于企业领导制度问题的通信 / 229
- 关于《陈云文选》的通信 / 231
- “板块说”、“渗透说”及其他 / 235

观察与对话

- 苏联见闻 / 241
- 韩国印象 / 252
- 老树归来 / 257
- 在中美经济学家讨论会的演讲 / 262
- 同越南政府代表团的谈话 / 266
- 同荷兰前首相吕贝尔斯的谈话 / 277
- 在哈佛大学的演讲 / 285
- 同韩国汉城国际论坛代表团的谈话 / 289
- 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(OECD)总部演讲后答问 / 294
- 在法国国际关系研究院演讲后答问 / 300
- 就“中国发展高层论坛”答中央电视台记者问 / 304
- 同澳大利亚议会代表团的谈话 / 314
- 同美国专家谈中美贸易逆差 / 319

同美国民主中心主席艾伦·温斯坦的谈话 / 323

同美国共产党主席塞缪尔·韦伯的谈话 / 331

世界潮流和有机农业 / 335

求同存异和存同求异 / 339

同日本前驻华大使佐藤嘉恭的谈话 / 343

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第22届年会开幕辞 / 350

人物与纪念



我与北大

003

在北京大学五年的学习,对我几十年来的工作和人生道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,势必还会影响我的余生。可以说,没有北大,就没有我的今天,也没有我的昨天和明天。

我 1958 年暑假在河南省沁阳第一中学毕业,进入北大经济系学习。我原来是喜欢文学和历史的,幻想成为文学家和历史学家。后来所以选择经济学,是受了 50 年代中期经济建设高潮的感召,以为经济学是经时济世之学,学习经济学或许可以为国家多做事。

我在北大学习那几年,国家正值多事之秋,学校不是世外桃源,当然不会没有不愉快的事情。记得一位学者说过,快乐是短暂的,悲伤是长久的。但回首往事,不愉快的事情早已烟消云散,北大留在我心灵深处的,是美好的回忆和永不磨灭的怀念。

北大对我最大的影响,概括地说,是在两个方面:

一是专业知识的把握和治学方法的训练。北大的专业知识教育是扎实的。当时,陈岱孙、罗志如、樊弘、赵靖等有名的教授,都给本科学生开课,甚至给低年级学生开课。赵靖先生开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

课,是全国高校的首倡。罗志如、樊弘、范家骥等先生开的西方经济学课,在当时也是独一无二的。厉以宁先生当时只有三十岁左右,他讲授外国经济史条分缕析,深入浅出,深受同学欢迎。老师们的渊博知识就是榜样。图书馆是开放的,丰富的藏书有很大的吸引力,可以借阅包括解放前出版的图书、报刊和杂志。经常举办学生自由参加的各种讲座。我没有浪费这几年的宝贵光阴。60年代初经济困难时期因病休学大半年时间,在校学习的五年没有回过家,所有的寒假、暑假乃至星期天,都是留在学校读书的。除读经济学,还漫无计划地读了不少文学、历史和哲学方面的东西,使我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以经济学为主的杂家。当时我对中国经济思想史产生了兴趣,学年论文题目写的是孙中山的经济思想,毕业论文写的是朱执信的经济思想,因此而研究了一些关于近代史和近代思想史方面的资料。指导老师赵靖先生教我怎样做卡片,怎样拟论文大纲,以及文章的起、承、转、合,使我受益匪浅。我感觉到,所有授课的老师,在教学中都是毫无保留的,总是想方设法让学生多学点东西。也许是巧合,甚至是幸运,我从北大毕业后一直从事笔墨生涯。先是做编辑工作,后来长期在国家领导机关做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工作,参与一些重要文件的起草,公余种“自留地”,自己写些东西,成绩都还不算太坏。基础是在北大打下的。在北大所受的教育,使我享用终生。

二是科学和民主精神的培养。科学和民主是中国现代化的需要,也是北大的光荣传统。北大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领域独树一帜,起着拔新领异的开路先锋作用。毋庸讳言,在“大批判”愈演愈烈,个人迷信之风日炽的年代,这种精神是受到严重压抑和摧残的。但在北大,它从未泯灭,至少可以说,北大比全国其他地方要好一些。当时,蔡元培先生的“兼容并包”思想在北大也是受到批判的,但细心的人都会感受到它的潜流。在图书馆和资料室,可以读到多少可以反映一些世界学术动态的图书和资料。老师在课堂讲授和课后辅导时介绍不同学派的观点,虽然经常是小心翼翼地以“批判”的形式进行的。持不同见解甚至

是不同学派的老师，相互之间彬彬有礼，友好相处。成名成家的思想是受到公开批判的，但不少老师私下还是鼓励学生立志成名成家。我至今记得樊弘教授的话：诗从放屁始，文从胡说来，青年人要有勇气，大胆写，开始不要怕写不好。以我当时并不怎么高明的俄文水平，他介绍我参加《政治经济学中的主观学派》一书的翻译工作，经过翻译实践使外文水平提高了一大步。老师对学生提出的各种见解是容忍甚至鼓励的。张友仁先生讲斯大林的《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》，期终考试我在答题中批评了他的一个观点，他不仅毫不计较，反而给我打了满分。姑不论孰是孰非，单是这种气度，就永远值得我学习。这些年来，当我先后在几个研究单位担负领导责任的时候，在北大培养起来的科学和民主精神对工作起了很好的作用，使我能够兼听不同见解，采纳诸家之长，共同做好工作。

1964年经济系本科毕业，我想入非非，报考北大新设立的国际政治系研究生，竟以高分录取。因为上级领导机关要人，研究生没有读成，从此离开北大。很快就遭逢十年动乱，直到70年代末才恢复同北大中断多年的联系。在许多学术活动场合，经常碰到北大的老师和同学。我发现，由于在逆境中坚持读书和思考，虽然历经磨难，他们的学业没有荒废，思想更成熟了，有些人成为有影响的学者。我从他们身上汲取了力量，并且因为著作方面的一点成绩而得附骥尾，成为北大出身的学者队伍中的一员。我为此而深感荣幸和自豪。

1985年，我的大孩子考入北大，1989年毕业。1991年，小孩子也考入北大，1996年毕业。我作为北大学生的家长，和北大多了一层关系。我于1991年受聘兼任北大教授，1993年起任博士生导师，又回到了母校，成为北大教师队伍的一员。这些年来，除带几名博士生外，还参加北大的一些学术活动，作过几次关于经济问题的学术报告。每次进入北大校门，都有一种归家之感。每次在北大参加活动之后，总要在校园里走一走，湖光塔影，一草一木，都引起亲切的回忆，仿佛又回到了学生时代。

北大是我生命的一部分。我二十岁入北大,时值北大建校六十周年。今年北大举行一百周年校庆,我已经六十岁了。人生是短暂的,对于一个人的生命来说,六十岁已经步入老年。但是,对于一所大学来说,一百岁还是青年时期。北大的前途正未可限量。北大的前途取决于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,也有赖于每一个北大人的努力。我知道,不论过去和现在,北大对于它的每一个成员,都寄予厚望。在这里,我要记下使我深受教育的两位老师,他们的赠言成为我的座右铭。一位是年逾古稀的闵庆全先生,用他工整的小楷,全文书写了文天祥的《正气歌》,裱好送我。一位是年近九旬的熊正文先生,他赠我七律一首,并以其擅长的篆书写好送我。诗中除了表达“盛服登庸科科举,相经有术马群空”的美好愿望外,还语重心长地写道:“十亿舜尧心托重,甘霖渴望雨田公。”北大教给我的,不仅是知识,而且是知识分子做人的原则。在母校百年庆典之时,除了用北大所给予的一切竭尽全力报效国家外,我还能说些什么呢?

1998年2月26日

北大旧事

(一)

007

友仁^①吾师大鉴：

几年不见，时在念中。收到惠赐大著《北大恩师》一书，近又在《经济学家》杂志读到您纪念陈岱孙先生百年诞辰的文章，知道您仍笔耕不辍，将亲身历见告诉读者，留下一份宝贵的信史，不胜敬佩之至。

《北大恩师》一书，我是收到后在出国途中一口气读完的。多数篇章都引起我很大的兴趣，获得许多新的知识。惭愧的是未能及时复信报告读后感想。

首先是加深了对您的了解，知道您在西南联大的经历，以及解放前后所作的那么多有意义的工作。这是我在学校时从未听您讲过的，也一直没有听别的同学说过。由此亦可见您的谦虚精神。现在把您的这

^① 张友仁，北京大学教授。

些经历写下来,我觉得是非常之好的。因为这是北大历史和北大精神的一个具体的组成部分,是值得纪念的,也是应该继承的。

从您的记述中,我也增加了对其他几位老师的了解,特别是对赵乃抃先生和周炳琳先生。至于陈岱孙先生,因为有了比较多的宣传,我和他有交往,先前已经知道一些。

我没有听过赵乃抃先生的课,似乎在我入学之前他已经不讲课了。我在校期间,只是在经济系集会时见到他,印象最深的是他那漂亮的胡子和工整的小楷。20世纪80年代初《披沙录》问世,对他学问用功之勤感触颇深。1981年5月在北大参加“赵乃抃教授从事学术活动五十六周年纪念大会”,对他的生平才算有些了解。读了您的文章才知道,现在被全世界经济学界普遍采用的“制度经济学”这个术语,竟是赵先生1929年在其博士论文《查理德·琼斯:一位早期英国的制度经济学家》中,最先概括和使用的。我认为,这种概括是对经济学说史的一个贡献,而绝不简单是一个概念和术语的问题。现在各种版本的经济学说史均未提及此点,实在是个缺憾。您的文章,也使我对于赵先生一生的经历和政治态度有了全面的了解。

周炳琳先生,我也没有听过他的课。我在校期间只是从传闻中得知他是五四运动中的学生领袖,后来成了国民党政客,仅此而已。读了您的书,使我知道了周先生何以被称为国民党政客,以及他在政治上所经历的迷误。您以至亲的关系(这也是我过去所不知道的),在目前条件下仍能坚持实事求是之精神,不为尊者和长者讳,着实不易。更重要的是,我从您的客观记述中,了解到周先生一生经历中的许多难能可贵之处,用目下时髦的话说就是“亮点”。除五四运动中站在斗争前列冲锋陷阵外,还有1920年与邓中夏等共同发起组织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;1925年从欧洲回国后参加李大钊领导的国民党左派;1936年与许德珩等向刚刚长征到达陕北的红军赠送火腿、怀表和布鞋,得到毛泽东致函感谢;抗战期间对周恩来所领导的中共驻重庆办事处的同情和帮助;以及北京解放前夕不随国民党南下而留在北大;等等。所有这